

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*

安大伟

提 要: 方志不仅有史料价值,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,集中体现在小序、按语、论赞等之中。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地位,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;宣扬其道统,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。此外,还凸显“满洲根本”的政治原则,实质仍包含在“大一统”思想之中。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,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,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富的革新思想,如针砭时弊、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、振兴实业、抵御外侮、重视教育等。系统阐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,展现出时代变革影响下方志编纂思想的变化。

关键词: 东北方志 序论 思想价值

“地方志书,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。”^① 地方志有多种特点,其中资料性是根本特点,也是其有别于地方史的显著特点所在。但是,方志又不仅仅是资料汇编,在凡例、序跋、按语、论赞中往往包含作者对时政发表的评论,或称之为政论,集中体现方志思想价值,可以窥见社会变革背景下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变化,从而将地方志与思想史、政治史、社会史研究紧密联系起来。我们今天利用方志,不仅要关注其史料价值,还应关注其思想价值,这是以往方志研究中的薄弱环节。

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3种:小序、按语、论赞。小序居一门之首,普遍存在,是方志的基本组成部分。按语和论赞在有些方志中会出现。按语,如《昌图府志》《镇安县乡土志》《黑龙江述略》《长白汇征录》等,均以按语形式发表评论。《彰武县志》《新民府志》在“备考”中进行议论,也可视作按语的形式。论赞,如《怀仁县志》《呼兰府志》正文之后以“论曰”和“职方氏曰”形式进行评论。除以上3种主要形式外,还有不少格式上未加标识,在正文中夹叙夹议的情况。

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特点是由其特性决定的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空间上的地域性,评论对象一般是地方人、事、物;二是时间上的时代性,论述内容详近略远;三是综合性,内容丰富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各方面;四是语言简练、平实,长论较少;五是乡土志编写简略,议论相对较少。

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作者即志书实际编修者,一般是地方知名文人。从内容上看,方志序论主要有4种形式:一是颂扬式,如《长寿县乡土志》载:“数传至太祖,已兼有满洲、蒙古地,县境界居其间已三百年,宜早经开垦,乃曲体下情,恐其安土重迁,不忍驱策,其深仁厚泽之旁敷,岂有极乎。”^② 二是批判式,如《黑龙江述略》载:“开办之初,需费较多,历久而后享利

*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、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18ZDA174)成果之一。

① 国务院第467号令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,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《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》,方志出版社,2009年,第3页。

② 刘清书修,王丙辰纂,柳成栋点校:光绪《长寿县乡土志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9年,第474页。

实大。惜始事之人，未经通审全省地势商情，舍此而就彼也。”^① 三是劝谏式，如《呼兰府志》载：“莫若概停例饷，拔其合格者收入营伍，官为廩之，余则驱之于农田，愿业工、商或入学堂者，听其择途从事。则旗丁之生计自裕，而国家亦实收整军经武之效矣。”^② 四是论述式，如《新民府志》载：“果使疏导浚治以通轮船，其利赖将无穷也。”^③

一 清代东北方志思想内涵

清代的东北不仅是一个方位词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首先，东北是清朝“龙兴之地”，清朝崛起于东北，盛京是清朝的陪都。因此，在官修史书《皇清开国方略》《钦定满洲源流考》《钦定满洲八旗氏族通谱》《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》《满洲实录》《钦定八旗通志》中，都体现出清朝贵族对东北区域深厚的地域文化认同。以乾隆《钦定盛京通志》为例，其《圣制》《纶音》《天章》3门，共17卷，收录清朝历代帝王的御制诗文，多为东巡盛京所作的御制诗文，以及歌颂先祖及故乡之作。《国朝人物》1门，17卷，载清初开国功臣事迹，而不载入关后东北历史人物。《京城》《宫殿》《山陵》3门，均为其他地区方志所无。清前期东北方志与其他地区方志相比，最大的区别在于，方志在保存地方历史记忆的同时，又保存清朝兴起的历史记忆，因而被赋予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。

郑永昌认为，《盛京通志》的编修“试图唤起满族的历史记忆，凝聚满族文化共识”^④。张一弛认为，《盛京通志》“构成了盛清时期多种面向的‘大一统’政治文化”^⑤。实际上，清前期东北方志既包含满族记忆，也包含“大一统”思想。归根结底，是清朝统治阶层在东北方志编纂过程中对清朝正统论的构建。“大一统”是正统论中“治统”的组成部分；而所谓的“首崇满洲”，并非是“大一统”的对立物，而是在“大一统”语境下探讨的政治与民族政策，是“大一统”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景象。

到了晚清，东北受到异国异族侵略，具有区别与其他地区的“边疆”内涵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是方志向近代转型的时期，其中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史论结合。评论性按语明显增多，如《昌图府志》《镇安县乡土志》《黑龙江述略》《长白汇征录》等，均以按语形式发表议论。《彰武县志》《新民府志》在“备考”中进行议论，也可视作按语的形式。还出现了不少论赞形式，如《怀仁县志》《呼兰府志》正文之后以“论曰”和“职方氏曰”形式进行评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格式上未加标识，在正文中夹叙夹议的情况。这些议论性文字着重探讨如何加强地方建设，以达到抵御外侮、救亡图强的目的，代表着清末地方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，具有较高思想价值。

二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中的正统论

清代尤其是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，有相当多篇幅论述了清朝统治阶层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，借修志表达清朝政治意图和文化理念。任何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欲建立长久稳固的统

①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39页。

② 黄维翰修纂：《呼兰府志》，《黑水丛书·黑水郭氏世系录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785页。

③ 管凤龢修：《新民府志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，南京凤凰出版社，2006年，《航路》，第256页。

④ 郑永昌：《百年变迁：清初〈盛京通志〉的编纂及其内容探析》，《故宫学术季刊》（台北）2015年第2期。

⑤ 张一弛、刘凤云：《清代“大一统”政治文化的构建——以〈盛京通志〉的纂修与传播为例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6期。

治，必须要接纳主流儒家文化以承继“道统”，接续历朝统绪以承继“治统”，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王朝的“正统”。“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政统和道统，并以承继者自居，始终是清朝满族统治者认同中华历史文化的政治与文化的体现。”^①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中表达出清朝的国家认同，既体现于政治认同——对中华统绪的继承与深化，又体现于文化认同——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。而少数民族掌握政权，正统论中又包含“首崇满洲”的政治原则，究其实质，仍包含于“大一统”原则之中。

（一）关于清朝治统的论述

一是关于政权合法性。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，与久居中原地区的汉族有较大的民族差异和文化隔阂，证明政权合法性是清朝入关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。编修方志，正是阐述清朝得国之正的方式之一。如《吉林通志》载：“明初建都司于此，实得控制之宜，惜其后不能及远，自失形便，此与三卫之弃，同为失计而已。”“其域外经营疏略若此，则其后之日蹙。虽曰天命，抑岂非人事哉！”^②明宣德末年，朝廷已无力管控奴儿干地区，以夷制夷的羁縻招抚政策逐渐转变成以争夺贸易凭证——敕书的部族兼并战争。康熙《盛京通志》中也说“辽地自辽金袭渤海五京之制而形势分明，省郡县为卫所而边隅狭”^③，认为明代在东北实行的卫所制不如辽金时期的郡县制。《辽中县志·乡镇》小序载：“溯自前明靖难兵起，燕地井里凋敝，满目萧然。至我朝定鼎以来，偃武修文，休养黎庶，其乡村之联络，市集之辐辏，大盛前代。”^④这些序论指出，明朝对东北边疆治理不善，故清朝取而代之，且经营盛于前代，侧面为明亡清兴的合理性作注脚。

《盛京通志》提出“国家受命于周”^⑤，认为清朝政权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周朝。其《职官》小序载，“国家设官分职，皆因前典而斟酌之”^⑥，可见继承了前朝的职官制度。这都说明清朝统治自觉接续中原王朝统绪，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历史文化认同。《盛京通志》记星土，“我国家受策膺图，玑衡在握，天命既集，象纬告祥，箕尾之躔，寅宾日出，福德所钟也”^⑦；记山川，“神皋奥壤，实我国家所以发祥受命者也”^⑧，认为清朝获得政权，乃是承天受命、天命所归，宣扬君权天授。按照这样的思路，认为“王气所萃，攀鳞附翼者，咸在其间”^⑨，而清初人才之兴盛，也都是钟灵毓秀、上天授予，天人感应的结果。天命论成为构筑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。

二是关于统治合理性。“政统”或“治统”的正当，不但要证明获得政权的合法性，还要证明当下统治的合理性。因此，清前期东北方志中有大量宣扬皇朝文治武功和统治者雄才大略的话

① 向燕南：《从政统和道统的认同看清统治者历史文化认同的问题——对新清史论者的一个回应》，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9年第5期。

② 长顺修，李桂林纂，李澍田等点校：《吉林通志》卷12《沿革志三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09、217页。

③ 伊把汉等修，哲备等纂：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6《建制沿革》，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，第1页。

④ 韩宝濂修：《辽中县志》卷3《舆地编二·乡镇》，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47册，第443页。

⑤ 汪由敦等修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26《物产》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刻本，第6页。

⑥ 汪由敦等修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13《职官》，第1页。

⑦ 阿桂等修，刘谨之等纂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22《星土序》，辽海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366页。

⑧ 阿桂等修，刘谨之等纂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25《山川序》，第405页。

⑨ 汪由敦等修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19《人物》，第1页。

语。如《盛京通志》载：“太祖辟土开疆，继以太宗，功德隆盛，爰及世祖，正域四方。今天子宵旰图治，罔有暇逸，以致六合向风，输诚纳贡者，万国且共球矣。其幅员之广阔，物类之茂美，人民之爱戴，政事之舒长，高出前代，驾轶隆古。”^①颂扬清朝诸帝的伟业，渲染四海升平，统治昌明。该志序田赋：“我皇上加惠陪京，蠲租赐复，巡轩莅止，叠沛恩纶，旗地官庄，兼施休助。”^②颂扬乾隆朝蠲免田赋之仁政。序城池：“遗堙故垒，昔为边防守御之资者，兹当万国车书之日，已无所用之矣。”^③赞扬康熙帝倡导“中外一家”“天下一家”，前朝遗留的边关也无执行防范“夷狄”的作用。

此外，清代疆域大一统，也使得清朝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居于统治的合理地位。如序兵防，“宁古塔、黑龙江将军之设，非独善因前典而重肩叠戣，盛京之势愈安磐石，永万年而晏然者也”^④。经国大计，首在边疆，清朝在东北边疆经营上作出很大成绩，不断加强兵防。“维时幅员狭隘，亦未有如今日同江、爱浑诸地方数千里之广，系归版图者也。”^⑤清朝直接有效地控制吉林、黑龙江地区，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，这一点似已超出历代王朝“守在四夷”“有国无疆”的羁縻政策。又如《塔子沟纪略序》曰：“历朝虽或占据其地，不过数年间随得随失，诟能设立舆籍以垂久远？惟我朝定鼎以来，中外一统，蒙民向化，垂百余年。今上御极之五年，设官分职，建立署宇，俾千古从未开辟之疆域登之版图，而体制威仪得与内地无二。”^⑥以疆域的实际控制规模，清朝是实现“大一统”政策较彻底的王朝，并且大大推进了边疆内地化进程，在构建多民族国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（二）关于清朝道统的论述

一是儒家文化认同。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，政治高度伦理化，所谓“华夷之辨”主要指的是文化而非血统的差异，是故顾炎武有“亡国亡天下”之说，道统比治统更加重要。因此，清朝入关后积极推行尊孔崇儒政策，充分吸收并改造儒家文化，以避免由文化排斥而造成的政治抵制。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，体现了对科举和学校的重视，如《盛京通志·凡例》载：“国家重道崇儒，体宜独尊，今特详于学校，非他祀典可并矣。”^⑦突出学校的地位。《学校》小序载：“太祖缔造丕基，百度肇举。太宗创业垂统，鼎建学宫，遂开诗书礼乐之化。逮世祖章皇帝、圣祖仁皇帝，圣圣相承，凡所为弘文治、尊正学者，有加无已。至世宗宪皇帝，临雍讲学，崇圣推恩。”^⑧此又展现清代皇帝崇儒重道。选举方面，也是及时地通过多种途径选拔盛京各类人才，“国朝承累代之制，山林隐逸有求博学宏词、有辟制科之典，终弗更易，多其途而收之”^⑨。

二是强化道德教化。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，同样为清朝统治者安定社会、教化臣民、整饬

① 伊把汉等修，哲备等纂：康熙《盛京通志·边声廷序》，第2页。

② 阿桂等修，刘谨之等纂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37《田赋序》，第658页。

③ 吕耀曾修，魏枢纂：《盛京通志》卷15《城池志》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咸丰二年（1852）补刻乾隆元年（1736）本，第1页。

④ 汪由敦等修：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17《兵防》，第15页。

⑤ 伊把汉等修，哲备等纂：康熙《盛京通志·张鼎彝序》，第5页。

⑥ 哈达清格修：《塔子沟纪略序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23，南京凤凰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页。

⑦ 吕耀曾等修，魏枢等纂：《盛京通志·凡例》，第4页。

⑧ 吕耀曾等修，魏枢等纂：《盛京通志》卷21《学校》，第1页。

⑨ 伊把汉等修，哲备等纂：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16《选举》，第1页。

人心提供理论支持,成为清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。此期东北方志也多宣扬纲常伦理,强化对百姓的道德教化,如康熙《盛京通志·列女》提出:“人生戴天履地而无愧者,惟扶植纲常,敦修伦纪,为世完人而已。”^①乾隆中叶后,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,官修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》《贰臣传》《逆臣传》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等史书,意在扶植纲常、教化民心。乾隆四十九年本《盛京通志》,《忠节》由前志1卷扩充至5卷,《列女》由前志1卷扩充至4卷,人数大增。其《孝义》序言,“我朝崇起教化,扶植纲常,其孝义著称者,可以光前,可以劝后”^②,大力褒扬忠孝节义,又将“其死事辽东诸臣,俱附载《名宦门》,其系辽人而临难捐生、成仁取义者俱列入《忠节门》。谨将锡谥之由附识卷端,俾知崇奖忠贞,益以风励臣节。圣人植纪扶纲、大公至正之心,天下万世莫不共仰焉”^③。明清鼎革之际在关外辽东战场上与清军作战的明将,原为清朝史书所隐讳,至此也纳入东北方志《名宦》《忠节》之中,可见在修志过程中清统治阶层明史观的变化,以及纲常伦理准则的贯彻。宣扬忠孝节义、规范社会生活秩序是其官方修志活动的基本宗旨之一。

(三)“首崇满洲”与“大一统”论

一是强化“满洲记忆”。清朝满族人数远远少于普通汉人,所以强化满人的统治地位是清代历朝统治者都煞费苦心的事情。清朝采取“首崇满洲”的基本国策,以保证满族的特殊性与优越性。康熙年间纂修的东北方志已经开始突显盛京陪都的尊崇地位,而不仅是展现地方风土民情。如《盛京通志》序载,“将留都名胜之盛典与祖德宗功,并昭垂于奕世”^④,可见修志具有以地系史、以史崇地的倾向。该志认为“陪京者,帝业之基也”^⑤,“金城汤池,翼翼大壮,根本益固矣”^⑥,则视盛京为帝业根基、清朝根本之地。然而,入关后满洲部族对自身的认同逐渐陷入危机,直接表现就是作为满族的文化标识——“国语骑射”的衰落。尤其到了乾隆年间,不少满人官员不会说满语、不能使用满文草拟奏折,且腐化怠惰日益严重。面对“汉化”挑战,清朝皇帝日益强调满人的“祖宗之法”,对此,其时东北方志编修也自有体现。如《盛京通志·坛庙志》序言“帝王凝休永命,道莫大于尊祖敬天”^⑦,明确提出“尊祖敬天”的政治纲领。作为满族“龙兴之地”,清代东北地区方志编修的目的之一,即使其子孙“无忘祖宗祥发之有自”,“缔造之维艰”^⑧。慎终追远,因而不断提醒阅满人先祖勋烈创业之艰辛。“宫阙规模大备,而尚朴贵俭之德昭然在也。所以贻谋示后者,至深远矣”^⑨,以俭朴训诫后代百姓。记兵防,“我皇上觐光扬烈,翠华临莅,秋郊弭阅,赏赉有加,复命增设弁兵,修缮甲仗,诚以讲武诘戎不可一日不备也”^⑩,以言八旗劲旅尚武之风不能丢。“国家起自东方,其俗浑厚惇悖,刚毅而不挠”^⑪,以言淳朴刚毅的民族性格当继承。乾隆十三年本和四十九年本《本朝人物》一门只记载为清朝

①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27《列女》,第1页。

② 阿桂等修,刘谨之等纂: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87《孝义》,第1357页。

③ 阿桂等修,刘谨之等纂: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56《名宦四》,第913页。

④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·董秉忠序》,第6页。

⑤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1《京城志》,第1页。

⑥ 汪由敦等修: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5《京城》,第1页。

⑦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2《坛庙志》,第1页。

⑧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·张鼎彝序》,第7页。

⑨ 汪由敦等修: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5《宫殿》,第7页。

⑩ 阿桂等修,刘谨之等纂:《钦定盛京通志》卷51《兵防》,第842页。

⑪ 伊把汉等修,哲备等纂: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卷26《风俗》,第2页。

建立重要功勋的开国功臣，而不载入关以后人物，“追惟骏烈于翊运诸王及干城师清之士，详征事迹，胪著于篇”^①，以保存、唤起满族的历史记忆，增强其凝聚力。另外，清前期东北方志编修中，各门小序多历数该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绩。如《盛京通志·帝王》小序载：“太祖高皇帝辟土开疆，肇基王迹。太宗文皇帝创制显庸，声教覃敷。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，统一区宇。圣祖仁皇帝治隆化洽，宝历绵长。世宗宪皇帝圣德广运，至治光昭。皇上恭绍鸿图，垂亿万世。”^②这也是清朝统治阶层尊祖敬宗的表现。

二是“首崇满洲”与“大一统”的关系。应该说，用“汉化”与“满化”来形容清朝民族交融都是片面的。实际上，清朝既认同汉文化的核心价值——儒家思想，继承前朝政治制度，又努力在制度与文化中保持满洲部族自身的风格，在“汉文化”与“首崇满洲”之间展现了一种平衡。“华夷之辨”与“大一统”不是对立而是辩证的关系，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，都会在民族矛盾激烈之时，强调本民族正统地位。因此不论是汉人建立的王朝所强调的“华夷之辨”，还是满人建立的王朝所强调的“首崇满洲”，都是在“大一统”框架内展开的讨论。满族掌握政权后，要保证其统治地位，就要破除“华夷之辨”，实行“大一统”政策，学习儒家文化，继承中原王朝治统与道统。但是满族毕竟是少数民族，为防止因“沾染汉俗”而被同化，还要通过禁旗人学汉文、限制参加科举考试、修筑满城、提倡“国语骑射”等方法保持其民族特征，以及通过政治、经济上一系列特权保证其民族优越地位。其统治思想的逻辑顺序是清晰可见的。

如上文所述，东北方志编修中颂扬陪都、强调“祖宗之法”、追述开国战迹，在表层上以凝聚满族为目的，而其实质则是让广大汉人百姓实现对清政权的认同，是清统治者构筑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政治文化策略，也就是在“大一统”框架内，在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，更强调满族的主导地位。这样，既弥合了满汉之间过大的差异，又尽量保持其民族自身的特性，这也是清朝皇帝在处理满汉关系过程中所不断寻求的一个平衡点。而清朝统治的成功，也正在于建立起包容性较强、能够容纳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政治体制。

三 清末东北方志序论中的革新思想

研究边疆史地，是晚清经世思潮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现存120余种清代东北方志，大部分成书于清末光宣时期。甲午之后，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，刺激了学者的忧患意识。旧有价值观动摇，东北方志关注的焦点从维护清朝正统地位和宣扬纲常伦理，转移到如何应对社会危机。其序论中反思批判意识增强，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经世思想，方志的思想价值显著提高。

首先是针砭时弊。近代以前方志尤其官修方志，一般秉承“书善不书恶”的原则，以颂扬本朝统治为主。改革主导着晚清社会文化潮流，革新的前提是发现当下体制中包含的种种弊端。清末方志编纂中，仁人志士重审现实，痛陈时弊，不乏真知灼见。如《黑龙江述略》载：“自将军萨布素公移齐齐哈尔城，北至俄边几三千里，仅一副都统官控制其间，承平既久，厝火积薪，当事者漫不为意。咸丰八年，分江为界，将军奕山公奏报，以江左空旷无人，并不声明四至里数，虽属仓皇定计，意图粉饰，亦实由地势辽阔，夙未究心。”^③指出晚清黑龙江地区之所以屡遭沙俄侵略，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、奕山边防部署的疏漏有关。又论：“官由部选而来，率多

① 阿桂等修，刘谨之等纂：《钦定盛京通志·国朝人物序》，第992页。

② 吕耀曾等修，魏枢等纂：《盛京通志》卷29《帝王》，第1页。

③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卷2《建置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32页。

部属供事，资格既深，无聊就外，六年俸满，别无升途，仍需赴部另选，苟有出众之材，亦必不投身荒漠。吏治不飭，盖由于此。”^①指出清末黑龙江吏治不飭，原因在朝廷任官制度不当。《长白汇征录》载：“时而称松花，时而称混同，几无定名。在统一时代尚无关隘，现海禁大开，强邻窥伺江河，藉端生事，无理取闹，名称稍涉牵混，则乘间抵隙，攘夺利权，名之为义大矣哉。”^②指出我国舆地著述地名指称的混乱，给外敌攫取利权以可乘之机。又论：“各项宗教论祸福，不论道理，故流弊滋多。孔孟之教以道理为主，而祸福因果置之不论，故行至千百年而永无弊。此释道所以不及儒宗万万也。”^③指出宗教论祸福而不论道理的弊端。光绪《盘山厅志》载：“不讲卫生，厉气侵之，是生瘟疫；不治沟洫，水旱无备，是成凶岁。此人事也，非天道也。防之之术宜精求焉。”^④古时将瘟疫与自然灾害归因于“天道”，附会荒诞，言语不经，作者从科学的态度予以反驳。

其次是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。鸦片战争后，国内有识之士“开眼看世界”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。甲午战后，更加注重学习西方政治文化、社会科学、吸纳新思想，改革也着眼于社会各层面。此时期方志从传统向近代转型，时间观念上由循环的历史观向进化的历史观演变，空间观念上开始从世界中认识中国。一是粗具世界视野。最迟至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《尼布楚条约》的签订，中国已经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。鸦片战争的失败，使中国从“天下的中心”变成世界的一国，列强侵华的惨痛现实击碎了以自我为中心的“天下四夷观”。由古代轻视外夷一变为近代积极向西方各国学习。《昌图府志》载：“泰西各国，力致富强，皆藉商力，以为前驱。英人之于印度，其明证矣。我国素无保商奖商新法，故商战不甚激烈，因以日趋贫弱，非无故也。”^⑤鉴于古代中国重本抑商，由此提出要学习西方发展商业。《黑龙江述略》载：“考泰西各国，首重矿政，设立公司，君民共之。开办之初，实亦利害参半，积以岁月，始专其利，其要在积本之厚，任人之笃。”^⑥此又针对矿政不够重视而言。《绥中县乡土志》载：“今之世界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。欲谋国祚之绵长，而立富强之基础，唯在求实而已。士业、农业研究焉，而急为改良；工业、商业考察焉，而急思进步。试观英国大儒斯迈尔、法国政治家卢梭、德国外交家俾斯麦之三人者，世界上称为伟士，孰非由实事求是苦心自修得来。”^⑦列举欧洲杰出人士斯迈尔、卢梭和俾斯麦，说明求实为富强之基，已有主张学习西方的开放意识。二是吸纳进化史观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严复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《辟韩》诸文，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。光绪二十四年，严氏译述的赫胥黎《天演论》出版，大大推动中国人观念世界的革新。如《海城县乡土志》载：“廿世纪为天演竞争大舞台，商战不修即不免为外人淘汰……就我固有之业，逐

①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卷2《建置》，第31页。

② 张凤台修，刘龙光纂，黄甲元、李若迁点校：《长白汇征录》卷2《山川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61页。

③ 张凤台修，刘龙光纂，黄甲元、李若迁点校：《长白汇征录》卷4《风俗》，第121页。

④ 杨绍宗修：光绪《盘山厅志·灾祥六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3，南京凤凰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53页。

⑤ 洪汝冲修：《昌图府志·实业志·商业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0，第412页。

⑥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卷4《贡赋》，第67页。

⑦ 佚名修：《绥中县乡土志·实业》，《东北乡土志丛编》，辽宁省图书馆，1985年，第202页。

件改良，即可为抵制外人之具。”^①可见作者有明确的世界观念、进化意识。又，《彰武县志》载：“处此优胜劣败之世界，尚昧然罔觉，不思远计，则生计日窘，何以立于竞争剧烈之场。是以讲求实业，有不容稍缓者矣。”^②则指出各国竞争，优胜劣汰，必须奋发图强。《辽阳乡土志》载：“士仅半化，农工商亦皆固陋守旧，无进化思想。故一受外潮之激刺，愈觉形见势绌云。”^③斯言中国落后于世界，因中国百姓缺乏进化思想。此外，进化论和文明论往往紧密相连。如《昌图府志》载：“彼中末裔且将日就渐灭，不知其果为文明进化乎？抑亦生计日穷，为人类竞争大势之所迫而然也。”^④《锦西县乡土志》载：“若县界民风则近于刚，刚则强，强则可以自立。是在移风易俗者，日进于文明斯可矣。”^⑤所谓进化，乃又蒙昧而进于文明之社会。之所以清末方志政论中会出现世界意识和进化史观，直接原因在于有很多新式学堂学生参与了方志编纂。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，废科举、兴学堂、派遣留学生，新式知识分子在戊戌维新时期出现。新式学堂中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占据较大比重。所以在方志政论中表达了前所未有的、迥别于旧式文人士大夫的新思想。

再次是振兴实业。方志的近代转型，不只体现在修志思想的变化上，还体现在志书内容和修志目的的演变上。简言之，内容由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史，转向民众的社会史，向社会深层发展，广泛反映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。目的由维护清王朝统治转向解释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和富强之道。振兴实业，发展经济，是清末东北方志序论中着重讨论的内容。如《怀仁县志》载：“自古地方之贫富，不在人口之多寡，而在实业之盛衰。”^⑥宣统《铁岭县志》载：“惟有提倡实业，督飭工商，奏精巧之实功，行抵制之手段，则民无业者而有业矣，利外溢者而内复矣。”^⑦可见充分重视实业对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性。具体而言，又分为农、工、商等各部门经济。农业方面要大力兴办屯垦，《黑龙江述略》载：“使如吉林省例，大兴屯政，广设民官，则岁入不可数计，内可以省司农度支之繁，外可以杜邻敌覬觐之渐，固本实边，莫善于此。”^⑧指出既能增加政府收入，又能固本实边。《呼兰府志》中作者认为：“觐国者，以物产之盈虚，测民生之荣悴，故关于物产之调查，须区别其种类，考察其产地与效用，及施以人力而效用可以增长者，洪纤必具，以为振兴实业之张本。非如《山经》志异、《博物》搜奇，仅为学术上之研究已也。”^⑨明确要详细调查物产种类及效用，以为兴办实业所用。《镇安县乡土志》提出：“值此商战时代，华洋互市，利益交争，凡百货之输入输出，尤宜实力讲求，竞握利权，以为商务振兴之基础。”^⑩明言商战时代，振兴商务是关键。《辑安县乡土志》“古之善治国者，通商必急于惠工，工艺者诚商业之嚆矢也”^⑪，指出商业繁荣的前提是工业兴盛。

① 管凤龢修，王壬林纂：光绪《海城县乡土志·商务结言》，“辽宁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册，第214页。

② 赵炳燊修：《彰武县志·户口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5，第677页。

③ 洪汝冲修：《辽阳乡土志·实业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4，第625页。

④ 洪汝冲修：《昌图府志·宗教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0，第400页。

⑤ 于凌霄修：宣统《锦西县乡土志·风俗》，《东北乡土志丛编》，第84页。

⑥ 洪汝冲修：《昌图府志·实业志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0，第406页。

⑦ 徐麟瑞修：宣统《铁岭县志·人民疾苦》，“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”稿抄本卷，第23册，第123页。

⑧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卷3《职官》，第48页。

⑨ 黄维翰修纂：《呼兰府志·物产略》，《黑水丛书·黑水郭氏世系录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858页。

⑩ 张霁修，王振廷纂：《镇安县乡土志·商务》，《东北乡土志丛编》，第188页。

⑪ 吴光国修：《辑安县乡土志·工政》，吉林省图书馆，2011年影印本，第2册，第10页。

复次是抵御外侮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列强通过《璦琿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强占我国东北领土，国家主权步步沦丧，国民经济受到严重侵害。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边疆治理政策。此期东北方志编纂强化了现实功能，贯穿有关边防情况的记载，表达出抵御外侮、实边固防、救亡图强的爱国精神。如《怀仁县志》论曰：“大江对岸即是强邻，森林、矿产又久为外人所慕。宰斯邑者，保利权、奋武卫，宜杜渐防微，勿负东南保障之任，斯可矣。”^① 倡言保卫我国领土与资源。《长白汇征录》载：“传曰：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，系就关锁时代而言。至门户洞开，则四邻多垒，非筹边不足以图存，非练兵不足以守边。”^② 强调强化边防守卫与军事训练。《辽中县志》载：“城之坚不若心之固也……所贵布德施惠以固众心。”^③ 指出固圉实边首在巩固人心。《黑龙江述略》提出：“论防边大计，水师之重，略与陆师相当……俄自分江而后，汲汲于试行轮船，居心尤为叵测，固不待智者有戒心也。”^④ 指出加强水师建设的重要性。

最后为重视教育。传统社会重视儒学教育，延续道统，教化百姓遵循三纲五常，培养为皇权统治服务的人才。至20世纪初，西学取代中学，在文化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培养各行各业需求的技术人才，兴干实业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。虽然清前中期和清末东北方志均重视教育，但其性质截然不同。《新民府志》载：“生齿日繁，蒙昧如昔，谓能自存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，吾未之敢信。然则急起直追以言教育，时不我待矣。”^⑤ 要求通过新式教育，开启民智。《怀仁县志》载：“是必兴教育，正民心，养成无形之险，以收有用之效。”^⑥ 主张通过教育，开民心，新民德。光绪《盘山厅志》提出“振兴商务，非立商学、开商智不为功”^⑦，要求建立专学，培养专业人才。《呼兰府志》提出：“教育之道基本家庭，然则女学者，其所谓国民教育之母乎？”斯又倡导女学，男女平等。

结 语

清前期是大清理、大总结阶段，晚清时代环境变迁，促使学术风气转变，不同时代造成思想倾向不同的方志序论。清前期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将“东北”视作“满洲根本”，晚清则更多地将之视为边防重镇。因而，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论述正统论的内容较多，而清末随着方志的近代转型，方志序论所关注的是如何救亡图强。长期以来人们仅将方志作为一种史料看待，近些年又流行“历史书写”的研究范式，二者之外，还应该关注方志的序论——集中体现了方志的思想价值。“志”在维护社会秩序、延续价值观念、总结治国理政经验方面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其思想价值有赖于学者进一步挖掘的探讨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马俊显修，刘熙春等纂：《怀仁县志》卷2《地理·沿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9，第7页。
 ② 张凤台修，刘龙光纂，黄甲元、李若迁点校：《长白汇征录》卷3《兵事》，第80页。
 ③ 韩宝濂修：《辽中县志》卷5《建置编一·城池》，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47册，第463页。
 ④ 徐宗亮纂，李兴盛、张杰点校：《黑龙江述略》卷5《兵防》，第72页。
 ⑤ 管凤龢修：《新民府志·户口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，第259页。
 ⑥ 马俊显修，刘熙春等纂：《怀仁县志》卷2《地理·形势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9，第16页。
 ⑦ 杨绍宗修：光绪《盘山厅志·商业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辽宁府县志辑13，第348页。